

# 樂觀瀟灑 幽默有趣 細說黎東方「細說史」

塵 紓 文、圖

月前在本欄介紹專研明末清初歷史的學者謝國楨時，提及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讀過他的《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而除此之外，還有多款二手參考書，當中以黎東方《細說明朝》最為有趣。

有趣？這種感覺乍聽來似乎與寫史或讀史之事永遠無緣。史真的可以寫得有趣，讀得有趣？答案是，有的。你只消翻閱黎東方以「細說」體裁寫的歷史，定必感到輕鬆流暢、明快幽默、意趣盎然。為什麼他可以本該枯燥乏味的歷史寫得生動有趣，看之不厭呢？要了解他如何有這般能耐，得從他的成長說起。

## 留學法國 中西兼擅

黎東方（一九〇七至一九九八），本名智廉，原籍河南，生於江蘇，父親是舉人公。也許是幼受薰陶，他早年讀了很多古書，為未來的學習打下穩固基礎。及長，他考進清華大學，主攻歷史，並有幸成為梁啟超的關門弟子（按：他是最後一班的四名學生之一）。及後負笈法國，進入巴黎大學研習西史，並於三十年代初以最優異成績取得博士學位。他由於學識廣博，為人圓通，在學術界很吃得開，不論是民國時代的內地以至其後的台灣，或美國及其他地方，都是各所大學爭相羅致並委以要職的對象。

無論何時何地，黎東方的教學事業都是順暢無阻，而終其一生，他基本上與人為善，絕不斤斤計較，亦從不惡意批評學術界任何人。他本身幽默風趣，兼且自嘲能力極強。據學生唐德剛憶述，他「是一位終生樂觀，嘻嘻哈哈，瀟灑不羈，甚至玩世不恭的名士……一生在任何遭遇之下，任何逆境之中，都從未垂頭喪氣，或愁容滿面的悲哀過……永遠是一位笑口常開的彌勒佛……在他把原名的黎智廉改名為黎東方時，他說，他的原意是東方黎明，而不是漢代的滑稽大師的東方朔，不幸的是，他把名字改糟了，結果卻做了一輩的東方朔……我的老師黎東方就是一位現代中國真具體而微的東方朔。作個現代東方朔，亦足垂不朽矣。……」（見「講三國說民國的史學大家」【代序】）

黎東方辭世後，唐德剛聯同其他同學在老師喪禮上共賦一輓聯：「研百家，成一家，輕輕鬆鬆，便為巨帙，龔宇同尊彌勒佛。講三國，說民國，嘻嘻哈哈，不拘小節，全僑永憶地行仙。」在本該莊嚴的輓聯裏，居然用上「輕鬆」、「嘻嘻」此等毫不莊重的字眼，就可以明白黎東方性格上就是彌勒佛、地行仙。由是觀之，他本質上、性格上就十分適合寫「細說」歷史。

## 首位史家 售票講史

不過，在刊行「細說」歷史之前，他早於抗戰年間，就在當時所稱的「陪都」重慶擔任多項工作，一邊任職於史地教育委員會和大學用書委員會等組織，一邊舉辦收費講座。據悉，他選定了某個大會場作為固定的講座地點，定時在場內以漫談細說形式及以輕鬆幽默口脛演講，先是三國歷史，其後暢談武則天。不管是哪個講題，觀眾都樂意買票入場，細心聆聽。他的講座，套用戲曲術語，每場都「滿坑滿谷」，即是說，全院滿座，絕無虛席。大家必須明白，他在重慶的講座，斷非一般的街頭說書，借歷史事跡而隨意鋪演，甚至天馬行空，亂說一通。他所說的，盡皆依據史實，按史鋪陳，既無肆意添加，更不扭曲附會。

黎東方繼重慶演講成功，聲名大噪，隨即轉赴昆明，依樣葫蘆，重演一遍。當然，講座受歡迎的程度，與先前在重慶相若。余生也晚，無緣趕及他在渝、昆演講的盛況，但他所著的叢書，卻有緣捧讀，也因此有幸在此與讀者分享。他著「細說」史的最大特色，是多數以人物或歷史事件作為每節的標題，而不採用斷代史慣用的體裁。

## 「細說」系列 先清後明

本來按照出版先後（詳見配稿），他的《細說清朝》是最早面世的單行本，而《細說明朝》次之，但我倒想介紹《細說明朝》。我選談此書，斷非因為我少年時先讀此書，因而有「先讀為主」的感覺，而摒棄《細說清朝》。選明史，棄清史，純因史學研判。

滿清一朝雖然是外族入侵後而建立，

也儘管清廷口中說「滿漢一家」而在任官施政方面卻是「滿漢分家」，但骨子裏特別是制度方面，確實是在極大程度上「承明舊制」。正因如此，要了解清朝歷史，必先暢曉明朝史實。簡言之，明史不匯通，清史休想看懂。

我手執的《細說明朝》，是七十年代在香港買得的六九年香港壹版，屬於「文星叢刊」的叢書。黎東方在書內第一節「明朝值得細說」先解釋為什麼在刊登細說系列的時候，「說了清朝，才說明朝，是把中國的歷史倒過來敘，這一種敘法，也有道理。因為，我們對於近的比較親切，對於遠的比較陌生。先把比較親切的加以分析、了解，然後再去分析、了解那比較陌生的，於是陌生的也就漸漸變成了親切的了。」（頁一）

他這種解釋方法，倒也貼合人的習性，但不像史家的說法，也挺有趣。不過，他隨即在下一段說明：「清朝之所以能在入關以後立足得住，在於沿襲了明朝制度之長，而革除其短。單憑這一點，明朝便已十分值得我們加以研究。況且明朝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的確不容忽視。它推倒了元朝的部族統治，而且光復了那已經失掉四百多年的燕雲十六州……稱臣的藩邦之多，史無前例……明朝也有富於傳奇性的人物：太祖朱元璋、鄭和、于謙、張居

正……」（頁一至二）

到了末段，他才說：「可惜，君權極大，而夠得上行使此極大權力的皇帝，僅有太祖、成祖，仁宣二帝有三楊輔佐，景帝與孝宗亦差強人意，其餘的非昏即愚，大權旁落於奸臣宦官之手。」（頁二）

## 《細說明朝》惜未中的

抄錄上文幾百字，無非是要指出幾個重要的可議之處。首先，粗通明史的人當必知曉，明朝根本沒有什麼重大而優良的制度傳給清朝；反之，明朝最大而最殘害中國的制度，卻給清朝承襲了。記得之前



▲中年時期的黎東方

行時為配合實情而改為現稱



## ▼可參閱的明朝史書



九十年代末的內地初版



## ▼歷代正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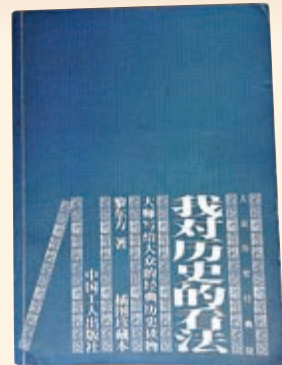
▼此書未及完成，黎東方卻因病離世，後由王子今補遺



▼按寫作時序，此書是「細說」系列第一本。圖為內地九七年版



▼此書匯集黎東方約二十篇文章，包括「王安石」一文



▼此書按遠古，春秋，戰國收錄二十多篇文章，後附十章「細說孔子」



◀這是六十年代末在香港發行的初版



## 《細說》系列出版歷程

主事者勉勵他「勇闖」（他自己的用語）這一關，他不得不勉力施為。二則，他在寫作過程中患病險死，但未待完全康復，就再執筆「闖關」。

到了九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向黎東方致意懇請他允准內地出版他先前寫就亦即上述分別細說元、明、清、民國的四本書。黎東方深感「於離開故鄉父母之邦五十個年頭以後，重新能與祖國史學界以文字相會，共同切磋，增進知識」（見內地版「自序」），於是慨允所請，並親自執筆作序，而當中的《細說民國》為求切合實情，易名為《細說民國創立》。

鑒於黎東方去國半個世紀，建國後的內地學子對他毫無認識，而只有在三四十年代修業的學子才認識他，出版社特邀內地知名史家鄧廣銘和唐振常為這四史（其後加上《細說三國》）作總

我在介紹史家謝國楨時明確指出，明朝最大的「特色」，也即是明朝最大的歷史失誤，是早在明初即明太祖洪武十三年藉胡惟庸之事廢除宰相。我當時已引述黃宗義（梨洲）在其《明夷待訪錄》的說法：「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洪武年間的宰相胡惟庸設若不賢，縱或謀反屬實，其職固然可撤，其罪亦可論誅，但斷不可以藉故撤走宰相之職，致令中國從此陷入「獨夫」（一人專權）困境，平白斷送了我國皇權與相權互抑互濟的千年優良傳統。我國上至秦漢，下迄唐宋，無不是皇權與相權彼此制衡，互相補足，連蒙古人入主中原而建立國祚未及百年的元朝，也設有丞相之職。

廢了宰相，明朝皇帝便須兼負宰相之責；又由於六部互不統屬，而須改由皇帝直接管轄，如此一來，皇帝便成為「獨夫」，今後再不會受到須有的制衡。幹練的皇帝如太祖、成祖，或可肩起「獨夫」重任，但隨後生於深宮的皇帝，如何有效治國？荒怠如神宗，居然可以不朝數十載，國華日替，政務糜爛的情況，根本不言而喻。此外，皇帝苦無賢德副手，只好重用佞臣，寵信宦官，導致政事日衰。

## 明朝廢相 才是癥結

不過，黎東方那句話「君權極大，而

夠得上行使此極大權力的皇帝，僅有太祖、成祖……其餘的非昏即愚，大權旁落於奸臣宦官之手」，其實只說對了一半。須知昏愚皇帝，並非大權旁落，而只是授權非人。試看崇禎皇帝甫繼位，就誅滅魏宗賢一黨，足見皇權常在，只不過是前任諸帝，掌大權卻不用於正道而已。

皇權高漲的另一惡果是君臣之勢日趨傾斜。遠的不說，只從唐朝說起。唐朝皇帝很禮敬大臣，議政時大體上是君臣並坐；到了宋朝，君尊臣卑的情況轉趨明顯，議政時是君坐臣立；到了明朝，君尊臣卑的情況走至極端，不單是君坐臣跪，而且動輒得咎，慘遭廷杖，即在朝上用棍毆打大臣。這種視臣子為家奴的悲慘情況，完全敗壞了君主須尊重大臣的良好傳統。清朝所承襲的，就是這種叫人痛心的制度。

清朝康熙及前期的乾隆是鮮有的明君，才可以建造康乾盛世，但隨後的皇帝限於才智魄力，清朝就走上萬劫不復的衰敗道路。回望歷史，朱元璋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賢如史家黎東方，為何絲毫見他在書內首節清楚述及明朝真正的最大特色——廢相，而只管寫了一些次要的因素？後學如我，四十多年前初閱此文，確實百思莫解！

另一方面，我想從書內第六十至六十四節，即自「英宗」至「也先」、「土木之變」、「景帝于謙」，以至「奪門之變」，說明皇權如何強大。話說英宗志大才疏，居然率領宦官王振與不懂用兵的兵部尚書鄒瑩和一班文官嘗試「御駕親征」的玩意，抵禦也先入侵進犯，結果戰敗被俘，隨行的一些官員和王振被殺。這是明朝史上著名的「土木堡之役」。英宗後來幾經折騰才返回宮中。可惜由於他被擒之後，于謙等大臣擁立英宗弟朱祁鈺為景帝，及後英宗復辟，即史稱「奪門之變」，而復辟有功的宦官曹吉祥居功傲慢，兼且招權納賄，最後甚至密謀造反，怎料被英宗手到擒來，凌遲至死。由此可見，英宗儘管是個失而復得的不濟皇帝，但所擁權力之大，從瞬間誅滅曹吉祥可見一斑，（反觀唐朝「甘露之變」後，文宗不再視朝，而上一任皇帝敬宗更因故而被宦官弑殺。）黎東方縷述此等歷史時，怎會沒有意識到明朝皇權極為高漲呢？

除「細說」史外，黎東方也寫過不少散篇文章，當中有些收入《我對歷史的看法》（中國工人出版社，二〇〇八）一書內。此書收錄了二十多篇長短不一的文章。不過，當中最想提及的是「王安石」一文，不是因為此文闢闢高妙，也不是有待商榷之處極多，而是因為他在文末提及一件值得世人深刻反思的事。

本來此文是他因應業師梁啟超所撰的《王安石傳》而有意加述。在他看來，「老師的著作雖多，其內容之精美、客觀，而充滿了愛國心，以《王安石傳》為第一。」（按：學術界一般認為梁啟超的力作，首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及《清代學術概論》。他反選《王安石傳》，倒有力排眾議之心）關於他在文內覆述王荊公的變法新措施，由於知之者眾，不必細表。他在末段提及蘇軾起初激烈反對新法，但其後目睹新法確有成就，於是自覺錯誤，並向朋友說道：「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致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眾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亦覺疏矣。」及至王安石退休，蘇軾更前去拜訪他，甚至以詩相酬。黎東方稱讚蘇軾，認為他勇於反省認錯，衝破黨爭界線，確有士子風範。

## 細說流暢 立論未精

本文限於篇幅，無法詳述黎東方的史學特點。只可最後指出，黎東方固然腹笥淵博，甚至學貫中西，加上幽默風趣，細說流暢，把一般人認為沉悶枯燥的歷史變成輕鬆有趣的故事，這般能力，的確睥睨學林。然而，從嚴正的學術角度看，由於他並非專攻某朝，亦非精於某個門類，因此對歷史的研究未算深入，立論偶爾未及精確。

綜合而論，黎東方的細說史，用作趣味史書閱讀則可，用於史學研究就似覺不算最為適合。不過，這不就是他寫細說史的本意麼？